

12.0

合肥文史资料

统一战线在合肥专辑



90

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合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Y4239/12

前 言

1989年是合肥解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结合人民政协工作的特点，我们特编选这本《统一战线在合肥》文史资料专辑，以志纪念。

本辑收入丁继哲等回忆文章29篇。作者当中，既有长期做统战工作的党内老同志，也有几十年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其他爱国人士。有的人既是党的统战对象，也是统一战线工作者。他们的文章，大多从“我”的角度，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一大法宝。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就能充分调动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反之，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出现曲折，受到干扰破坏，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本辑还附有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作情况介绍，藉以反映他们对统一战线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合肥市政协党组对本书的采编工作非常重视，周军副主席审定了全部稿件。

由于本书辑录的稿件多系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加之不同时期统战工作有其不同的特点，具体政策上也有所变化，这样史实上和表述上可能有欠准确的地方，同时我们的编辑水平也有限，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10月

合肥文史资料·第六辑

统一战线在合肥

合肥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发行

安徽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5印张 118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皖非正式出版字A·90—153

工本费：1.80元

目 录

丁继哲谈解放初期合肥统战工作·····	(1)
统一战线与合肥和平解放·····	操云河 (5)
龚衡军起义经过·····	龚维启 (13)
我对统战工作的回忆·····	郭崇毅 (16)
在北京献艺的日子里·····	丁玉兰 (22)
统一战线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悼念胡耀邦 同志·····	方庆延 (29)
交以诚 动以情 晓以理——我与党外人士交友 友方面的几点体会·····	范 为 (33)
落实政策，我当政协主席抓的第一件工作·····	解正连 (38)
学习继承革命前辈做统战工作的精神·····	戚明春 (41)
我做统战工作的几件事·····	陶海山 (44)
变一任为二任——我是怎样做统战工作的·····	冯宏谦 (47)
当他悲观失望的时候·····	周翠梅 (50)
我做统战工作的体会·····	卞纯一 (52)
主动争取，做好统战工作·····	沙 駝 (54)
重视统战工作的典范·····	刘秉钧 (57)
忆我的知心朋友姚家升同志·····	蒋茂才 (60)
一位善做统战工作的党支部书记·····	胡文涛 (62)

何谦堂与统一战线·····	何道宏 (64)
统一战线指引我前进·····	唐南屏 (68)
首次接受统战教育的回忆·····	张善瑞 (73)
洒向人间都是爱·····	谢黛林 (75)
统一战线使我重新焕发了青春·····	高明文 (78)
对一起违纪事件处理的感受·····	杨振斌 (80)
落实政策给我新的生命·····	吴舜法 (83)
一次难忘的谈话·····	曹德林 (87)
海峡飞鸿夸“德政”·····	舒笑俗 (89)
我是怎样做好祖国统一联谊工作的·····	李海 (92)
有朋自远方来·····	许有为 (97)
父子进藏，建设边疆·····	纪元 (102)

附：合肥市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作情况介绍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肥市委员会·····	(111)
中国民主同盟合肥市委员会·····	(122)
中国民主促进会合肥市委员会·····	(133)
中国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委员会·····	(142)
九三学社合肥市委员会·····	(150)
中国民主建国会合肥市委员会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合肥市委员会·····	(158)

丁继哲谈解放初期合肥统战工作

编者按 丁继哲同志50年代初期曾担任合肥市主要领导工作，又先后任职于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南、蚌埠和安徽省政协，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1990年4月，我们专程前往马鞍山丁老寓所，请他就解放初期合肥的统战工作作一回顾和介绍。丁老欣然而谈。

我于1951年6月底到合肥工作，当时任市长兼市委统战部长，后担任市委书记，对那一阶段合肥地区统战工作情况，至今印象很深。但有些情况因时间太长，就讲不具体了。谈谈概况吧。

有利的背景和条件 解放初期合肥的统战工作搞得不错。三反、五反后至肃反前那段时间，政策比较稳定，统一战线形势很好，当时有一些有利的背景和条件，主要是：一、刚解放，共产党的威信高，群众、统战上层人士相信我们党，大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欢欣若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便于我们开展工作。二、群众情绪高。人民当家作主，他们拥护共产党，支持我们的工作，在对不法工商业者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群众都站在我们一边。试想，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没有店员工人合作，可能要困难得多。三、因为是省会城市，统战对象多，

做统战工作的人也多，市里做，省里也做。省委统战部和市委配合得很好，省里的处长、部长经常下到市里来和我们一道工作。当时市里只有民建会建立了工委，其他党派尚未建立市一级组织，各民主党派省一级组织也经常来做市属单位其成员的工作。四、解放初期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久经锻炼的老同志，懂得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同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不久，大家对进城工作应注意什么，对新时期党的城市政策掌握较好。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市委对统战工作很重视，我当市长兼统战部长，1952年底我改任市委书记后，章嘉乐同志当市长也兼统战部长。以后随着工作任务的繁重，统战部加强力量，配了副职，宣传部副部长张维克同志被选调为统战部副部长。给统战部配干部，总是派工作经验丰富、作风深入细致、政策水平高的同志。

主要的任务和对象 统战工作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改造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省委陆学斌、项南和市里的我，三人负责合肥市的“三大改造”工作。我们的统战工作也就围绕着“三大改造”而展开。主要任务和对象是：一、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当时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大多数是和我们长期合作共事关系的老朋友，例如民盟、民革、农工等一些主要成员解放前就和我们联系。二、做工商业者的工作。他们当中大的不多，多是中小的。三、做知识分子工作。知识分子中主要是中小学教员，做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四、做宗教界人士工作。在宗教界人士中主要是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现在看来，当时不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是不行的，在城市里搞五反，

对有“五毒”行为的人是一大打击，运动本身没有错，不过在斗争中也存在过“左”的问题，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把资本家艾元俊也抓起来了。偷漏税现象的确存在，甚至还很严重，但“矫枉过正”，又错罚了一些人，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这些问题很快得以纠正。对知识分子主要是查清历史问题，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乐于奉献。

具体做法和特色 当时的政策稳定，我们做统战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对统战对象，注意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出了点偏差，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例如：一、适时地调整政策。三反、五反运动对工商界震动很大，没收了一些财产，处罚了一些人，工商界内部对此存有一些疑虑。不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进行审查甄别，把艾元俊放了，把不该没收的发还了。对一些生产维持不下去的小作坊，在经济上给予扶持，帮他们提供加工定货，这样既“拉”了那些业主们一把，也使工人免遭失业，保护了劳资双方的积极性。二、给资本家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我们在调整劳资政策中，主动给资本家作些让步，让他们有利可图，让他们有一定的能力发展生产。我们还根据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上层人士在政治地位、思想表现中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工作，并安排他们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市人民政府做领导工作。三、发挥群众优势。合肥当时产业工人少，主要的群众基础是店员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积极性高，配合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但往往也有“左”的倾向。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及时纠正。1953年我当市委书记时，有一次借用市基督教堂开会，会场

上挂了毛主席画像。中途休息时，一神职人员把毛主席像给拿掉了，说什么教堂只能挂十字架，不像挂偶像。这件事引起与会人员公愤。我们对此没有迁就，但也没采取过激行动。而是和群众一起进行说理批评，你真主能和毛主席比吗？何况我们是借会场，在会场上悬挂主席像。后来那位神职人员承认错误也就算了，没有给他上纲上线。当然，在今天看来，还有个尊重教规的问题，在当时把它看成是原则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四、关心、照顾知识分子。50年代初期我们的物质条件还很艰苦，但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关心的。安徽医学院由怀远迁来，皖南大学由芜湖迁来改为安徽大学再改为安徽农学院，知识分子多了，我和像们中的不少教授都交上了朋友。尽管我住的是草房，但还是把淮河路上的一栋小楼分给安医汤立舟教授住。群众说：“合肥最好的房子给教授住了！”在我前、后任的李广涛同志、章嘉乐同志，他们都很热心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总之，当时全党有重视统战的好风气，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人们心情舒畅，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刘作普、戴健 记录整理）

统一战线与合肥和平解放

操云河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刚刚结束，谭启龙、宋日昌奉命率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向合肥进军。1月21日上午，先遣纵队四支队一大队临近合肥城下，合肥守敌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见大势不妙，率一个团慌忙弃城南逃。当一大队到达大东门时，守城人说：“县长请你们进城”。下午一时左右，我一大队一枪未发，开进合肥城，进驻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国民党合肥县政府随即派出人员前往店埠和撮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1月22日，新华社曾发电讯说：“合肥国民党南撤后城内国民党县政府和人员，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各就原职，保护文件、资产，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前来接管。这个榜样，足资各地国民党政府人员效法。”

刘汝明为何不战而逃，国民党县长又为何开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对此，当时就连纵队的领导都感到有些意外。1月22日晚，中共皖西军区三分区负责人唐晓光派马力、郭崇毅、龚衡军等率部赶来合肥城，一汇报，大家才涣然冰释。原来，合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共皖西军区的指导下，在合肥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他们对合肥城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全国人民、

各民主党派为“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民盟、民联（1948年元月起改为“民革”）等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1946年春，民盟盟员李湘若（时在国民党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工作）以安徽盟务联络员的身份从上海回到合肥。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盟员，开展宣传，进行民主活动。李湘若串亲访友，奔走各处，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经常注意向人们宣传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谈论时局真相，指出革命的美好前景。李湘若细致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先后有李春舫、郭崇毅、龚衡军、周介如、刘干、龚兆庆、董光升等10余人加入民盟。

合肥民盟发展壮大后，首先投入了紧张的宣传和收集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由李春舫、周介如负责。当时合肥民盟的宣传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收听转抄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社论和中共重要文件如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供参加和支持民盟组织活动的同志传阅；另一方面将上述新闻、文件等油印或石印成传单，分发给合肥及其附近的革命武装和进步人士、学生，或夜间张贴出去。同时加紧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并分类整理送给中共皖西党组织。1948年冬，合肥民盟将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各种密码连夜抄送中共皖西军区三分区。

1947年7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决定成立直属安徽小组（1948年元旦起，改为民革安徽小组）。8月底，民联安徽小组成员李海回到合肥，即和中共皖西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召集小组成员王宫（王汉昭）、丘金汤，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决定利用各自的关系和影响，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加强宣传，反对蒋介石

的反动统治。民联安徽小组的成员皆系国民党安徽省和合肥县军政要员，他们深知桂系军阀头目的贪污、受贿等丑恶内幕。为争取群众，李海等人在桂系中下层官员、军队中揭露这些内幕，同时指出国民党政权垮台已成定局，劝告他们不要执迷不悟，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要迷途知返，站到革命的方面来。在民联安徽小组的宣传影响下，一部分人觉悟起来，李德等人相继加入民联，投入汹涌面来的民主革命洪流。为了便于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及掩护民革的革命活动，1948年春，王汉昭利用其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长的合法身份兼任司令部情报所所长。不久，民革中央来信，要求民革安徽小组收集桂系首脑对内战的态度、桂系内部及桂蒋之间的矛盾等方面情况，并上报民革中央，以便转送中共有关部门。民革安徽小组成员利用他们职务之便，广泛收集，曾先后几次将这方面的情报送到上海联络点转交民革中央。

合肥民盟和民革安徽小组的组织宣传活动，促进了各阶层民主人士的进一步觉醒，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宣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安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各自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去影响敌人内部，瓦解敌人，争取了更多的人站到革命的方面来，壮大了革命阵营。他们收集的情报，为中共掌握敌情，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政策提供了依据，为合肥解放创造了某些条件。

二

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政治镇压，经济掠夺，使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合肥民盟根据中共皖西四地委的指示，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

展斗争。

1947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各厅、局公务人员，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合肥民盟借机组织发动了一次公务人员加薪斗争。在刘干、李春舫的具体策划下，一天，一群公务人员冲进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围住了省政府秘书长黄同仇。愤怒的公务人员打了黄的耳光，高喊要增加工资，否则斗争到底。面对愤怒的群众，黄同仇不敢反抗，被迫接受了公务人员的加薪要求。

同年四五月间，国民党青年军在电影院打了合肥中学的学生，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怒。李湘若、郭崇毅和合肥教育界名流、民主人士周景绍，请学生代表数人一起研究了发动学生进行斗争的计划，组织优秀学生深入各校，分头发动。学生们很快行动起来。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商人市民等也都投入了斗争。合肥城内掀起以学生为主的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他们高喊“严惩凶手”，“反对内战”等口号，并贴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美帝国主义滚出去”等标语。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十分惊慌，生怕惹出大乱子来，最后不得不接受群众提出的严惩凶手等要求。

加薪斗争和以学生为主的各界群众斗争的胜利，锻炼了群众，增强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也使国民党安徽反动当局看到了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

三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特别是淮海战役开始后，民盟中央和民革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指示合肥民盟和民革安徽小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立革命武装上，积

极策反，组织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迎接全国解放。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所谓“勘乱”，将区改为联防区，小乡改为大乡。合肥民盟抓住这个时机，积极组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早年深受中共影响的郭崇毅经活动当上了雷麻、焦婆大乡乡长。但乡公所只有十几条枪，为了扩大武装力量，郭崇毅决定发动贫苦农民，建立“兄弟联谊社”，组织群众，很快发展几十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民主自卫军第十二支队”，积极开展武装活动。

不久，郭的反蒋拥共政治面貌暴露后，国民党特务武装抄了郭的家，并在肥西、六安一带尾随追捕。郭奉中共皖西四地委书记唐晓光之命，将组成的游击队移交中共六合工委书记宣育华及老红军邹德胜同志直接指挥，自己则转移到解放区接受任务，先后曾任皖西解放区肥西南办事处主任和三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长等职，在革命艰难时刻，和中共党组织患难与共。

同年冬，四地委书记唐晓光要郭崇毅给合肥地方绅士、盟员龚衡军（原国民党合肥县参议长，郭的老朋友）多次写信，要龚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活动，掌握武装，发动起义。龚衡军开始有些顾虑，唐晓光又通过郭崇毅和周景绍做工作，介绍龚看毛泽东的著作，方使龚解除了顾虑，决心走革命道路。不久，龚衡军当上国民党合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控制了城乡11个连队的武装。1948年春，唐晓光同志又指示郭崇毅抓紧合肥与六安两处的策反工作，同时要求龚衡军尽可能扩大武装力量，暂时不要起义，服从整个战局的需要。淮海战役打响后，唐晓光指示龚衡军立即起义。于是龚衡军在官亭率千余武装起义，成立“合肥支队”，辖三个大队，

唐晓光任支队政委，龚衡军为支队长。

为了尽量减少对立面，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队，合肥民盟还十分注意争取地方武装。1948年，他们以革命武装为后盾，采取当面劝说，写劝告信，散发传单等方式，先后争取了舒合庐三县边区联防区主任、肥西的山南联防区主任、肥东的撮镇联防区主任、庐江县白石山联防区主任等，这些人有的投身革命，有的采取中立态度，争取和影响了大批地方武装，同时还利用职权，委派信得过的人任联防区主任。是年冬，合肥民盟派李平凡任肥西上派联防区主任。

1948年9月，夏威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民革安徽小组利用夏上任伊始，要物色一批军人出身的人担任专员、县长之机，暗中侧面推荐王汉昭为明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统辖武装万余人。王汉昭到明光专区后，即和李海通过共产党员郑汉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方向明取得联系，在中共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李海和王汉昭原打算以明光专区的武装为基础，发动皖东起义，后来方向明传来指示，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明光专区武装要转移到江南，待命起义。这样，王汉昭等率明光专区5个县团共6千余人开到江南，明光专区的全椒县团武装则就地举行了起义。

合肥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全国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所进行的武装策反和革命武装的建立，严重地削弱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壮大了革命的战斗力量。虽然有的不是在合肥，而是在邻近地区，但合肥附近反动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革命武装力量活动的增强，给合肥的反动派以强大的压力，使其感到孤掌难鸣，惶惶不可终日，促使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南迁及刘汝明部南逃，是合肥得以和平解放的原因之一。

四

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反动军队纷纷败北。国民党合肥县长汪廷霖见大势已去，藉病辞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准备派桂系上校军人韩蒙轩接任。消息传来，合肥民盟多次密商，经请示中共皖西军区及其三分区同意，为避免合肥遭受更大的灾难，促使合肥早日解放，决定一面推荐盟员龚兆庆积极活动，力争县长一职（龚曾任怀宁县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高级法院驻肥办事处主任，有资格当县长）；另一方面请合肥有声望的地方士绅龚嘘云出面组织一些地方力量，抵制韩接任并保荐龚为县长。龚嘘云，辛亥革命时期为同盟会会员，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不满，同情革命。他接受合肥民盟的委托后，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声望，组织了一些知名人士，拟就《地方公呈》，送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要求龚兆庆接任合肥县长。几经周旋，龚兆庆终于当上了国民党合肥县最后一任县长。为配合龚兆庆活动，合肥民盟又商派盟员殷乘兴、哈庸凡、董光升出任县政府主任秘书、民政科长。从此，国民党合肥县政府为合肥民盟所部分控制。接着，合肥民盟派哈庸凡专程去肥西我解放区向唐晓光汇报了情况，并请示工作。不久，中共皖西军区四分区派敌工部部长蒋树民来肥，布置工作。

年底，成立了民盟合肥工作委员会，主持合肥城的和平解放工作，龚兆庆为主任委员。

这时，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从淮南前线败退到合肥。刘部虽是溃退，但仍有上万人的武装，因此刘部的何去何从将直接影响到合肥的局势。合肥民盟根据中共皖西军区

三分区的指示，决定设法挤走刘部，使之南撤。刘部退到合肥后，到处抓丁补员。为阻止刘汝明扩充势力，合肥民盟先后秘密护送一二百名青年到皖西解放区学习和工作，还吸收青年到肥西集中，编入起义的地方部队。刘汝明曾令县政府在三天以内征集民伕500人，名为征伕，实为抓丁。龚兆庆采取硬拖软抗的办法进行抵制，始终未征一人。刘汝明的兵源补充未能如愿。县政府还利用刘汝明要他们刺探情报之机，经常送假情报给刘部驻军司令部，说人民解放军即将兵临城下，东、西、北乡皆有共军活动，每处大约二三千人，城南方面未发现共军活动，使刘部不敢轻易到附近骚扰，终日处于惶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合肥民盟利用朱幼农和刘汝明的旧交好友关系，请朱出面力劝刘汝明南撤。朱幼农时为刘司令部参议，和龚兆庆是同乡，赞助革命。刘汝明开始进驻合肥时，想住一段时间，休整军队，卷土重来，加之刘身为第八兵团司令，有镇守安徽之责，合肥是江淮重镇，不能轻易撤离，故并不打算继续南撤。但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也感到不知所措，常和朱幼农谈论刘部的前途等问题。朱幼农则趁机进言，指出利弊：当前，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合肥周围又有共军活动，部队只能龟缩城内，外无据点相呼应，战火一燃，只能坐以待毙！刘汝明听如是说，想想形势，不寒而栗，权衡利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刘部南撤后，龚兆庆即令其自卫队在城内的四个中队切实维持治安，同时急令驻在附近的县自卫队回城，加强城防，等候人民解放军进城。刘部南撤，直接促使了合肥的和平解放。